

“经济”辨析(上)

冯天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经济”本义“经世济民”。近代日本借用此一汉语旧词对译英文术语 economy, 含义变为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 兼指节俭、合算。今天我们习用的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 既与该词的汉语古典义相去甚远, 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 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词语。而“经济”所指概念的转变, 正透露了近代日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 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摆脱出来的取向。

关键词:经济; 经济学; 理财学

中图分类号:K 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 (2005)06-0005-08

“经济”是时下的常用术语,“国民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小吃”不绝于人们的耳际笔端。这些用例中的“经济”,是借用汉语旧词对英文术语 economy 所作的翻译,指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和,兼指节俭、合算。但考究起来,今天我们习用的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既与该词的汉语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词语。而“经济”所指概念的转变,正透露了近代日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摆脱出来的取向。

一、“经济”是中国固有词,其古典义为经世济民、经邦济国

作为汉语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其构词法为联合结构。

“经”本为名词,甲骨文、金文均为织机中由卷纱棍和绞纱棒横撑的多条直线的象形,象纺织的纵线,与横线“纬”对应,《说文·糸部》释曰:“织从(纵)丝也。”段玉裁注:“经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经”又通“径”,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路),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谓:“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经”后转为动词,含“治”义,常与“纶”联用(“纶”指用丝编成的绳,引申为有条理

义),如《周易·屯卦·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这些句式中的“经纶”作“治理”、“匡济”解。此外,“经”还与“略”组成“经略”,与“制”组成“经制”,意近“管辖”、“治理”。总之,作为动词的“经”,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谓:“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谓:“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意即“治国”、“治天下”,又称“经世”。“经世”连用,首见于《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这里的“经世”,据王先谦、章太炎考证,庄子的本意是纪世、世纪编年,却被援儒入庄的后儒释为治世、救世,这与儒家的入世主义有关,并不切合道家的出世理念。而在儒术占主导的时代,“经世”正是以治世、救世这些儒家意旨得以流传、广为运用的。

“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旁,可释为“渡”,意为渡水。济又引伸为拯济、救济之意,可组成“济民”一词,如《尚书》有“以济兆民”一类句式。

“经世”与“济民”联合成“经世济民”、“经世济俗”等词组,如晋人葛洪(约281—341)的《抱朴子·明本》说:“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该书还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有“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的句式。隋唐以降,“经世济民”之类渐为流行语,如唐高祖李渊(566—635)颁布的文告中有“经邦济世”短语出现(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此类短语还成了命名的源泉,远者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的名字,摘自“经世安民”(见《旧唐书·太宗本纪》);近人如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重要参加者蔡济民(1886—1919),其名更直取“经世济民”的后二字。

“经济”一词,作为“经世济俗”、“经世济民”的缩语,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义传》载,“八王之乱”间,长沙王司马义(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兄弟“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载,东晋简文帝(371—372年在位)做藩王时致殷浩书,评价殷浩(?—356)曰:“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晋书·纪瞻传》载,东晋元帝褒奖纪瞻的诏书称:“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袁郊《甘泽谣·陶岷》评价王岷:“岷之文学,可以经济”。

较早有影响的“经济”用例,出在隋代王通(?—617)的《中说·礼乐篇》,该篇称当时一个儒学家,祖传经世济民之学,但未逢明时,不得见用:

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王通这段话常被多种辞书作为“经济”一词的首出先例用,其实,它晚于《晋书》引述的“经济”用例约三个世纪。

唐代以降,“经济”的使用频率日高。如《唐书》的《玄宗本纪》赞曰:

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

李白《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杜甫《水上遣怀》:

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宋史·王安石传》:

朱熹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古时名联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夸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赞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经济)的能力。

《宋史》对事功派士人每以“经济”评论之,如

《宋史·叶适传》说叶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宋史·陈亮传》说陈亮“志存经济,重许可。”

明清小说多见“经济”一词,如《红楼梦》中贾政赞扬贾雨村注意“经济”,责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习“经济”。

上列文句中的“经济”,都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意指为政者“治理国家”、“拯济生民”,含义类似“政治”。当然,古义“经济”也包含国家财政、国计民生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关注国计民生,乃是经邦济国的一部分,故这里的“经济”没有脱离传统含义。

与“经济”含义相近的“经略”、“经制”等词多入官名,如唐、宋、明、清于沿边要地,设“经略使”,为边防军事长官(《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受高太尉迫害,夜走延安府,投奔的便是小经略使);宋、明又有经理东南财赋的“经制使”一职。而“经济”成为职官名的,则有金代的“经济使”(见《金史·傅慎微传》)。

据赵靖《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二文考,“经济”进入书名,常见于宋元以降,如宋人刘颜著《经济枢言》、马存著《经济集》、滕珙编《经济文衡》、元人李士瞻撰《经济文集》。明代以“经济”名书者更多,如《经济文辑》、《皇明名臣经济录》、《经济类编》、《经济言》、《经济文钞》、《经济名臣传》、《经济宏词》、《经济总论》等。清朝更有《皇朝经济文编》、《皇朝经济文新编》。明清涌现的种种“经济文编”,与两朝联翩而出的“经世文编”的内容及编辑体例相近,多为经世济民的方策结集,其间包含着愈来愈具体的关于财政工商方面的内容,诸如财计、赋役、屯田、盐法、茶法、河渠、漕运、工虞、货殖等类目,成为“经济文编”的主体(参见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第十一章晚清“经世文编”的编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时至晚清,“经济”一词仍沿用其古典义。曾国藩(1811—1872)力倡“义理、经济合一”论,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的《致诸弟》中,他便主张在传统儒术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之外,加上“经济”。这里的经济,指经邦济国的实学。同治八年(1869)曾氏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中，将孔学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又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问学》详论曰：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将“经济之学”列入孔门的政事之科，以突现理学的经世功能，也表明曾国藩仍在“经邦济国”，也即政治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而涉及国计民生的实学（如盐法、漕运、农政、兵政等），为“经济之学”的重要展开部。因曾氏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巨大影响以及时势的需求，“经济之学”在晚清渐成士子倾心研习的学问，此一词组也就不胫而走，普遍使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即戊戌变法前夜，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与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主张在科考中废除八股时文，代之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为内容的“中学经济”，以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为内容的“西学经济”（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8）。同年，贵州学政严修（1860—1929）请设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经济科目。因戊戌政变，此议搁置，旋即于清末新政时重新启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8月），清廷发布上谕，废除八股时文，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经济正科”，以策论试时事。经济特科于1903年开始实行，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清末新政的主持人张之洞曾担任过“经济特科阅卷大臣”。经济特科课试内容涉及“中学经济”、“西学经济”，其“经济”仍指经邦济国、经世济民，不过已包含中、西学术关于国家治理（财政、贸易、交通等为其大宗）的新近内容。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进展，使八股时文退出科考舞台，实为1905年废除科举的前奏。

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在传统含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如林乐知（Allen, Y. John 1836—1907）1875年10月（光绪元年九月）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中西关系略论》，其首篇《论谋富之法》便有“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的句式（见《万国公报》三五八卷）；《万国公报》四九七卷（光绪四年六月）刊载隐名氏的《关爱中华三书》，其第三书，有“天下万国之中，中华多经济之才，故为富强之国”的句

式，其下文又反复出现“经济”一词，如“此本为当强之经济”、“欲为富强之国，经济须预储也”、“当实求其经济”、“虽有经济而无近益”等等。同刊五三三卷，载署名“稍知时务者”的《劝士习当今有用之学论》，内有“大学问、大经济”的用语。西方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里多处出现的“经济”一词，皆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但重点已在“富强之国”、“富足之道”，预示着“经济”这一政治性古典词向国计民生含义转化。

二、日本早已在“经世济民”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江户时期经世实学勃兴，其经济论侧重国计民生问题

“经国济民”义的“经济”一词随同汉籍，很早便传入日本，时见于古代日籍之中。至近世（江户时代），以“经济”命名的日籍更多，如古学派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享保十四年，1729年刊），开宗明义诠释“经济”：

凡天下国家治理，皆经济云。

尧舜以来，历世的圣贤，尽心立言，垂教后世，皆此经济一事为之。

兰学家青木昆阳（1698—1769）的《经济纂要》、晚期儒学者海保青陵（1755—1817）的《经济谈》、将神道与洋学“混同”的佐藤信渊（1769—1851）的《经济要录》，以及中井竹山的《经济要语》、古贺精里的《经济文录》、正司考祺的《经济问答录》等书，所论“经济”，涵义皆为“经国济民”，或为其发挥，如佐藤信渊在《经济要录》卷15称：

所谓经济，乃是经营天地之神意，救济世界人类之业。

佐藤信渊还在《经济问答》中宣示：“经济者，国土经营，万货丰饶，人民济救之道。”讲的当然还是经世济民的政治论，然其重心放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这种注重研讨国计民生的经济论，正是日本江户时代力纠空谈虚议的实学精神兴盛的一种表现，预示着“经济”一词发生词义近代转换的趋势。

江户晚期的洋学，其经济论更倾向于国计民生问题的探索，而且将学习西洋科学和生产技术引入经济论。洋学家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提出国政的四大急务：第一，焰硝（掘采硝石，破碎岩石暗礁，开通水陆交通）；第二，诸金（开采金银铜铁铅诸矿物，作国家之大用）；第三，船舶

(造船及发展海运,使天下物产得以流通);第四,属岛开业(周边岛屿开发,尤其是拓殖北部边疆)。其“经世”一词,虽仍取古汉语的“经邦济世”之义,但“经世”的内容,已在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展开,并主张学习西洋科技。本多利明还著《经济放言》一文,其“赘言”讨论房屋、道路、桥梁的筑造,以及石材、铁材的运用如何仿效西洋之法;其“经济总论”讨论物产增殖,以满足万民的衣食住之需用,进而提出:作为“海国”的日本,解决此一问题的出路在扩大海外贸易。可见,江户时代日本人的经济论,虽然仍为经世济民的政治论,其重心已放在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上,并带有开放色彩。这为近代日本人以“经济”对译 economy 埋下了伏笔。

与近世日本类似,中国在宋元以降,随着经世实学的发展,“经济”一词也包含着愈益增多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内容,当然,这一切都纳入“经世济民”这一总题之内,也就是说,从属于国家治理此一政治性题目之下。

江户时期的日本除在“经济”名目下议论国计民生问题外,还常用“富国”一词。早于本多利明的林子平(1737—1793)曾撰《富国策》一文,探讨贫富问题。林子平的篇名效法中国宋代李觏(1009—1059)的专论《富国策》。当然,“富国”一词更有远源,司马迁即称春秋时的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战国时的荀子更有题名“富国”的专文(《荀子·富国》)。19世纪60年代末,清朝的京师同文馆设“富国策”课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讲授;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则著《富国养民策》(连载《万国公报》第43至88册,时在光绪一八年至二二年,即1892至1896年)。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1834—1901)在明治一八年(1885)著文,亦题名《富国策》(见《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

可见,日本人和入华西方传教士曾经不约而同地借用中国古典词,以“富国策”命名探讨国计民生问题的论著,并一度以之对译西洋术语 economics。至于“经济学”一词,亦为中国古来素有。唐人严维诗曰:“还将经济学,来问道安师。”(《全唐诗》卷263)此为较早之例。宋人朱熹评《陆宣公奏议》,有“此便是经济之学”的句式。《元史》卷一七二也出现短语“经济之学”。明清史籍中,品论时人,常有“当

务经济之学”、“好讲经济之学”的说法,并往往将“经济之学”与“性命之学”、“义理之学”、“掌故之学”相并列,作为学问的一个类别。前述晚清曾国藩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以外,加入“经济之学”,认为是士人必修之业。这些“经济学”、“经济之学”用例,皆指“经世济民之学”,然已包藏着愈益增多的国计民生内容,但毕竟未能突破泛政治、泛伦理的故套。日本江户前中期的经世家所用“经济学”一词,大体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之学”含义类似,至江户末期才发生变化,这与西洋术语 economy 的东传有关。

三、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Economy 的原义、演化义及其定型

汉字文化圈内的“经济”一词,从“经世济民”这一古典义转化为意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义,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 economy 的译词。而在西方,economy 一词有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英语 economy 一词从希腊文 *οικονομικος* 演变而来,西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著《经济论》(*οικονομικος*),其中希腊文 *οικου* 作家庭(家族)解,*νομος* 原意为法律或支配,引申为经营,二者组合成词,意谓“家政”、“家计管理”、“家族经营”,故色诺芬此书可译作《家政学》、《家政论》。这便是西方文化中 economy 一词的始源。晚于色诺芬半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将经济学的任务确定为研究取财、致富之术,关于奴隶的分配也是题中之义。亚里士多德将致富之途分作两种: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他认为前者才是自然的、正当的(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卷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23页)。总之,在西方,economy 的“家政学”含义是久远的,不过逐渐在发生演变。

至中世纪,economy 注入法律意义。16世纪 economy(家政学)与农学结合,乡村贵族多研习之。economy 又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含“神的摄理”意味。17世纪,economy 渐由“家政”义放大为国家治理义,如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特克里田(A.de Montchretien)1615年出版的 *Political Economy* 一书,可意译为“国家的秩序与统治”,其书还声称是“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蒙氏谓其所论

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容，是一种供“君主鉴”的读物，故称 Political Economy（可译作“政治经济学”）。

18世纪西欧的经济学论著渐多，启蒙思想家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 1755年为法国《百科全书》(修纂于1751—1780年间)撰写“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条目，与古希腊的“家计学”相区别，突出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5—1790)、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5)、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7)、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都采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如李嘉图1817年发表代表作，书名即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副标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欧洲18世纪以降的这些重要哲人的经济思想，也包含着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法则的探求，这使得 economy 一词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指与政治相关连的社会经济活动。

近代西方，economy 具有“经济”和“经济学”双重含义，19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学”宜加 ics 词尾，使其成为规范的学科名目，遂有 economics 一词出现。英国1843年创刊的著名周刊 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推动了 economics (经济学) 一词的普及。至19世纪后期，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分野渐趋明确，经济学专事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问题的研究。如威廉·杰文斯(W.S.Jevons)于19世纪70年代末提出，以 economics (经济学) 取代 political economics (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yshall) 1890年出版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以“经济学”名书。此后，economics (经济学) 与 political economics (政治经济学) 的分野渐趋明显。

至于 economy (经济) 的分层意义，也渐趋明朗，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 1773—1836) 在所著《政治经济学要义》中，首倡“经济”含义的“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此后 J·R·M (1789—1864) 在《商业辞典》中有类似论说(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 外编》译述此四分说)。经济的今义

由此大体定型。

四、幕末、明治间日本以“经济”对译 economy，“经济”含义变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交换之总和，兼含节省义

由于西语 economy 除具有物质生产、生义之外，曾在很长时段上与政治 (political) 连用，兼容政治治理义，而幕末、明治间 (19世纪中叶前后) 正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名目盛行欧美之际，此间日本人在寻求与之对应的汉字译词时，挑选含有“经邦济国”义的“经济”，就势在必然。如前所述，这一对译还与江户中期以来经世实学发展，“经济”一词已包含愈益增多的国计民生义直接相关。

日本以“经济”翻译 economy，始于文久二年 (1862) 出版的洋书调所教授堀达之助编纂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该辞典首次将 economist 译作“经济学家”，将 political economy 译作“经济学”。同一年，启蒙学者西周 (1829—1897) 在留学荷兰前夕，给松冈鳞次郎的书信中使用“经济学”一词，该信函说：

小生顷来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取之一端窥探，实可惊公平正大之论耳 (《西周全集》第一卷，宗高书房，昭和35年，第8页)。

从书信的语境看，所论“经济学”已不是古汉语中传统的“经邦济世之学”，而是指与“性理之学” (后来西周译作“哲学”) 相并列的西学的一种，但信中尚未展开论述。而该信下文出现的与程朱“性命之理”相对应的“经济之大本” (同上，第8页)，所论之“经济”显然又是“经邦济国”之义。可见，西周当时所用“经济”一词，含义尚处在游移状态，还没有正式形成近代意义的“经济”概念。

另一启蒙学者津田真道留学荷兰前夕著《性理论》，文末附识有与“天文地理数量博物之学”相对应的“经济政律”的提法。此处的“经济”仍是经世济民义，与政治学类同 (见上书，第15页)。

文久三年 (1863) 西周与津田真道留学荷兰，师事法学博士毕洒林，毕洒林撰一简牍，以示授受之法，内中将“政事学”分为五科：“一曰性法之学，二曰万国公法之学，三曰国法之学，四曰制产之学，五曰政表之学。” (见西周1863年11月所作笔记《记五科授业之略》，《西周全集》第二卷，第134页) 这五科的今译为：自然法、国际公法、国法学、经济学、统计学。西周此时以“制产学”对译 staatshuishoud-

kunde。他在“讲论学术之次序”时,对“制产学”作诠释道:

制产学,是富国安民之术,……(同上书,第137页)。

而在《记五科授业之略》的改稿本《五科口诀纪略》中,将毕洒林简牍所称五科翻译为:“一曰性法学,二曰万国公法学,三曰国法学,四曰经济学,五曰政表学”(同上书,第138页)。又将毕洒林“讲授业之次序”附记如下:

第一论性法,是为凡百法律之根源也,次论万国公法并国法……,而后论经济学,是富国安民之术,而论其道如何也,而终之以政表学,……(同上书,第139页)。

西周所用“制产学”与“经济学”同一含义,均指“富国安民之术”。在《性法万国公法国法制产学政表口诀》中,西周又用“制产学”,并释为“国富民安之道”(同上书,第141—142页)。可见,此时的西周徘徊在“制产学”和“经济学”两个译词之间。西周所用“经济学”,与“政表学”、“经国学”相对应,而“政表学”、“经国学”均指政治学,故西周所谓“经济学”已脱离“经邦济国之学”即政治学的意味,而专指国计民生之学。

稍晚,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C·Hepburn 1815—1911)庆应三年(1867)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 economy。

曾先后担任蕃书调所教授、开成所教授的神田孝平(1830—1898),明治初年著《经世余论》一书,在“经世济民”这一传统名目下讨论殖产、贸易等问题。而正是这位神田孝平,1867年(庆应三年)将译作定名《经济小学》,以“经济”对译 economy。该书原本为英国学者义里士(W·Ellis)所著(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1846年出版,1850年再版,可直译为《社会经济概论》),荷兰学士毕洒林1857年将其译成荷兰文,神田孝平据此荷兰文本译成日文。神田在序文中介绍,西方学校分五科(教科、政科、理科、医科、文科),其中政科分为七门(民法、商法、刑法、国法、万国公法、会计学、经济学),其前五门均属法学,第七门“经济学”已是今意之经济学。1868年该书更名《西洋经济小学》再版。该书还创制了一批对译西洋术语的汉字词,如“求取(今译需用,以下括号内省‘今译’),金馆(银行),工人又雇

作(劳动者),财主(资本家),财本(资本),作业(劳动),相迫(竞争),品位(价格),利分(利润)”,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该书还出现“经济的学”,已逼近“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

《经济小学》是汉字文化圈中较早以新义“经济”作标题的书,为以“经济”对译 economy 的先驱之作。

明治初年以“经济”名书的译作颇多,也偶有著作,略举如次:

《经济原论》,箕作麟祥、绪方仪一译,明治二年(1869)出版。

《经济说略》(英文),明治二年(1869)出版。

《经济莨言》,长江受益著,明治五年(1872)出版。

《经济便蒙》,何礼之译,明治五年(1872)出版。

《经济新说》,室田充美译,明治六年(1873)出版。

《泰西经济新论》,高桥达郎译,明治七年(1874)出版。

《百科全书 经济论》,堀越爱国译,文部省刊,明治七年(1874)出版。

《经济要旨》,西村茂树译,明治七年(1874)出版。

《经济学讲义》,大森钟一译,明治九年(1876)出版。

前述曾徘徊于“制产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西周,明治十年(1877)前后撰《经济学》,正式使用“经济学”,讨论衣食住行及致富等“国人生活的事”。

今义“经济”及“经济学”在日本广泛流传,还与福泽谕吉(1835—1901)的译述相关。文久二年(1862)福泽访欧,购得1852年苏格兰出版的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所著 *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uate Instruction* 一书(可直译为《学校及家庭用的经济学》),庆应三年(1867)福泽据此译成《经济书》,成为《西洋事情外编》的卷三。在《经济书》的“经济的总论”(今译“经济的本质”)中,福泽的译文将“经济学”定义为:

经济学的旨趣在于,人间衣食住需用的供给,增财致富、人的欢乐享受的获得。往古的硕学,始于经济的活动,著之于书,名为富国论(《福泽谕吉著作集》第1卷,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88页)。

该文追溯了经济学从古希腊的“家法”（今译“家政学”）演变为国家、国民生计之学的历史（同上书，第188—189页），并引述经济学家J·R·M（1789—1864）的论述，指出经济作为一种“学文”（即学问、科学），包括“物品的产出、物品的制造、物品的积累、物品的集散、物品的消费”（同书，第189页）。福泽又在未定稿《经济全书》卷之一总论中，将经济学的下辖科目分作四类：第一制产，第二交易，第三配分，第四耗消（转引《明治文化史》5学术，原书房昭和五十年，第548页）。这是“经济”四分法的完整表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与此类似，中江兆民（1847—1901）1892年在《四民之目醒》中则有经济含义“生产、分配、消费”三层说。

福泽、中江转述穆勒等欧洲经济学家的经济四分说或三分说。今用汉字术语“经济”的“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总和”的含义，源出于穆勒所论，经日本译著的中介，这就在“经济”一词中注入了新意（国民生产、消费、流通等）。在《经济书》中，福泽除“经济学”外，还多次使用“经济的学”这样的词组。福泽1868年又将美国经济学家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所著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一部分翻译为《经济学要论》（为《经济全书》卷之一，收入1870年刊行的《西洋事情 二编》），该书的总论探讨经济学的含义，福泽将 *Political Economy* 译作“经济”，并解释说：

“经济”与“富有的学”或“富国学”的意义、用法接近，然其学术含义又不尽同，盖富有之法一人可以达到，与一国致富其意趣有异有同。

经济学是致富的科学。同时又可定义为国富的科学。这都不十分尽如人意。财富的创造与支配的法，既要考察作为个人的人，更要考察作为社会的人。

由于福泽的《西洋事情》及其外编、二编在幕末、明治初广为流传，译词“经济”与“经济学”也就不胫而走。以后，福泽又在《劝学篇》初论（明治五年刊行）、《启蒙手习之文》（明治六年刊行）等论著中继续使用经济学一词，并从不同侧面定义该术语。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一词“节俭”义的产生。1862年出版的堀达之助编《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将 *economy* 的词义释为“家事之法，俭约之法”，意为主持家计的节俭之法。这是较早赋予“经济”以“节俭”

义的例子，而此种“节俭”义来自英语 *economy*。如前所述，*economy* 的语源为希腊文 *οικονομικος*，意谓“家政学”，而“节俭”是家政的题中之义。

继《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之后，福泽谕吉在讨论家庭经济问题时阐述“节俭”义，并使其普及开来。福泽所撰《民间经济录》讲“居家的经济”，该书明治十年（1877）刊行，以十五、六岁的少年为对象，宣讲“俭约的事”、“正直的事”、“勉强的事（即勤奋努力的事）”，强调“一碗冷饭、一根灯芯”都不应粗略对待、不应浪费，提倡“质素俭约”、精细地积累财产。当然，福泽谕吉并非经济节俭论者，他接受西方自由经济思想，并不赞成笼统“劝戒人民的豪奢”（《福泽谕吉全集》第十一卷，岩波书店，第364页），他的节俭论是分层次的：主张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应当多消费，不应一味节俭；而官僚、学者等消费者应当节俭。他于1870年撰写的《西洋事情 二编》中的《收税论》，主张贫民生活必需品低税或作为无税品，对“骄奢淫逸”的物品则应课以重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福泽谕吉著作集》第1卷，第254—266页）。明治十三年（1880）所著的《民间经济录二编》中再次发挥其节俭分层论，宣讲“处世的经济”，讨论财物的集散，一面批评放奢淫逸、费财耗资，称奢侈为“恶德”，一面提倡生产者多多消费，主张财富的散（消耗）与集（收入）相当，消费生活与生产活动二者平衡，以发展经济，保障“人间的利益”。这既与近代西方“新教伦理”中的节俭、勤劳以增殖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吻合，也带有自由主义经济论的意味。

与福泽谕吉同时的学者，还有以“勤俭”释“经济”的，如冈田良一郎（1839—1915）于明治6年作《勤俭论》（刊载《报知新闻》）。中江兆民也阐发“勤劳节俭”义。

总之，今日汉字语汇中常用的“经济”=“节俭”的这层含义，并非“经济”一词的古汉语义，若讨其源，当追溯至《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对经济（*economy*）的“节俭”义的翻译，而福泽谕吉《民间经济录》初编及二编对“俭约”义的阐发，则使此义得以普及。

明治年间，在现代义上使用“经济”和“经济学”的，还有另一著名启蒙学者津田真道（1829—1903），他于1868年刊行的《泰西国法论》中，使用“经济的学”这一短语，并诠释为“良好的财利之法”。

福泽谕吉的弟子、曾任庆应义塾塾长的小幡笃

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明治4—10年),更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林正明将福赛特夫人(Fawcett, Millicent 今译米梨盛,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法思德的夫人)的通俗著作译为《经济入门》,继神田孝平1867年的译著《经济小学》之后,使“经济学”再次进入书名。明治十年(1877)永田健助将同书译作《宝氏经济学》。明治十二年(1879)永田健助撰《经济说略》,为《宝氏经济学》的解说书。明治间享有盛誉的《明六杂志》中津田真道等人的文章,也多次将 political economy 译作“经济学”。

明治年间出现以“经济”命名的刊物,如明治十三年(1880)犬养毅在三菱的朝吹英二援助下办《东洋经济新报》,鼓吹贸易保护论。而田口卯吉(1855—1905)明治十一年(1878)刊行的《自由交易日本经济论》,则是日本人自著的第一部近代意义的经济学专书,所张扬的是自由主义经济论。田口卯吉还创办《东京经济杂志》,鼓吹经济自由主义。

总之,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人逐渐普遍地在社会物质生产、消费、理财及节俭、合算义上使用

“经济”一词,脱离了该词的政治治理之类古典义。而且,明治间的日本已译介欧美的各种经济流派论著,贸易保护论和自由主义经济论都有所阐扬。

19世纪80年代以降,日本翻译或转述的西洋论著,名曰“经济学”的更有多部。梁启超1902年撰《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意在推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于严复翻译该书(译名《原富》)理深文奥,读者不易理解,梁氏便借鉴各种日本人著译的经济学书籍,加以综汇阐述。梁启超的主要参考书有英格廉著、阿部虎之助译的《哲理经济学史》(经济杂志社1896年出版),路易士吉·科莎著、阪谷芳郎重译的《经济学史讲义》(哲学书院1887年出版),井上辰九郎述《经济学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8年出版)。这仅是明治中后期以“经济学”名目出版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参见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卢圣泉)

A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y

FENG Tian-yu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Economy means helping people by administering affairs originally. In modern times Japan translated the English terms of economy by borrowing this old term in Chinese, which means the summ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e word of economy with the new meaning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classic meaning in Chinese, but also can't be deducted its present meaning from its morphology. It is a term which is involved with unsuitable wa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to Japanese. The conversion of concept of economy reveals the recognition of social livelihood of Japanese in modern times and Chinese subsequently and the orientation rid from and the concept of pan politics and pan morality.

Key words: economy; economics; chrematistics